

商品的符号学本体论

保罗·科克尔曼 著

刘楠 饶广祥 译

主要论点

我们如何定义意义，以包含建议的言说内容和工具的功能，身份的价值和商品的价格？

我们在哪能找到一个既可以解释符号的商品化又可以解释商品符号学的理论？

如何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皮尔士的符号学、经济价值和语言意义、政治经济的利害关系与语言人类学的技术结合起来，同时避免知名的索绪尔陷阱？

马克思（Marx）和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和努尔人的牛的分析中，从看似简单的对象上揭示出相对连贯的意义解读。这些对象呈现出相对成组模式：说话和思考、分类和评估、体验和行为。这些普遍而深刻的对象，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和背景：空间和时间、内容和形式、质和量、本体论和宇宙论（Kockelman in press a）。马克思和埃文斯—普里查德他们天才的地方在于：依照社会关系、符号实践和物质加工，将日常对象和形而上学的概念理论化。

例如，马克思的商品本体论自身包含大量的二元区分（Marx 1967: 44-48）。如图 1 所示，商品是最顶层的节点，分解为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的产品）和价值（抽象劳动的产品）。先分析往下左边的分支（随后将分析右边的分支），使用价值分解为质（quality）（某种类型的效用（某种类型的效用：小麦或水）和量（quantity）（其它类型的度量——通常是由一个数字和一个单位组成，如三蒲式耳或两杯）。质又分节为工具（means）（如何使用质量）和目的（ends）（为什么使用质量）。工具还可以分节为直接（direct）工具（维持生计的工具：

鞋子和土豆)和间接(indirect)工具(生产工具:铁和皮革)。回到目的这个分支节点,目的(ends)分解成必需品(necessity)(满足生存需求的物品)和奢侈品(luxury)(满足人的爱好(fancy)生产的物品)。与质相对应的量分节为天然(nature)度量(基于一定理据性的度量单位,如步伐)和规约度量(convention)(基于相对任意区分的度量单位,如米)。回到另一个分支,价值分解为本质(essence)(价值本身)和表现(appearance)(交换价值幌子下的价值的各种形式:可以兑换这个商品的其他商品)。本质分解为实质(substance)(社会必要劳动)和量级(magnitude)(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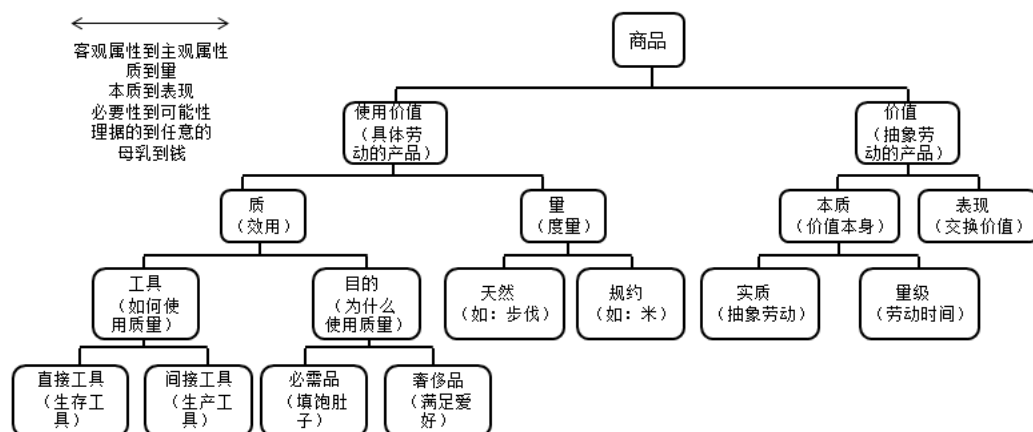


图1中,从左向右看,一个变化是从使用价值到价值,质到量,本质到表面,工具到目的,天然到规约,直接到间接,必需品到奢侈品。另一个普遍的变化是从客观属性到主观属性——从母乳到金钱。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商品都可以用这个分类系统描述。例如,三穗玉米(作为一份晚餐),可能会找到如下定位:它是一个直接的工具,它满足一个必要的目的,它是用天然单位度量,它花了一个小时来生产;可换12小块黄油(或10美分)。而五盎司黄金(可以制作一条项链)也可能会发现如下定位:这是一种间接的工具,满足了一个奢侈目的,以规约的单位度量,花了100个小时生产,可以换12000小块黄油(或100美元)。总之,至少在19世纪工业化的英国,在马克思尝试探索的人类学 and 历史的背景下,这个本体论可用于划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流通的任何商品的突出属性。

因此，马克思对商品的理解建立在二元本体论之上的，它最上面的分支（使用价值 VS. 价值）建立在其所说的政治经济的支点之上，即具体劳动产物的使用价值、人与自然跨历史（trans-historic）的关系；而价值是抽象劳动的产物，是人与人之间历史的一特定（historically-specific）的关系（Marx 1967:48-53）。虽然图 1 中，左边比右边阐述得更详尽，《资本论》只用很少的篇幅给使用价值，而价值部分占了 3 至 4 卷。事实上，在第一卷第一页，马克思将“事物的各种用途”以及“建立社会认可之上的度量这些对象的标准”归为“历史的工作”（1967:43）。换句话说，不管马克思的系统对捕捉使用价值的各种属性如何有帮助，他仍将效用（utility）和度量（measure）置于政治经济范围之外。

虽然马克思的商品本体论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质和量（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但他的大多分析力量还是源自黑格尔的哲学观（见亚里士多德 2001a；米克尔 1995）。虽然主客二元是哲学的掣肘，但二元论内不断地进行二元区分——或辩证地讨论，以克服二元论自身的局限。（这些二元配对理解应为相对观念：最好想象为一个连续的两极而不是一个相反的两端。）此外，有人可能会认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资本固有的，因此他的本体论是对象固有的：必须借用资产阶级社会的分类，来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也就是说商品同时成为分析的对象和分析的方法。这样，立足于主客二元的本体论是 19 世纪资本的概念反射，因此它必须作为一种解释资本主义形式的理论工具。波斯东（Postone）（1993）沿着这条思路对马克思进行的精妙解读，他认为《资本论》可以理解为一部具有批判意义（critical）的资产阶级社会民族史。

这篇论文也赞同这样的论点，但这篇文章尝试使用四种有轻微差别的战术。首先，本文分析商品是基于符号学而不是辩证法，因此不从系统的主客二分，而是采用符号——对象——解释项三分展开分析。其次，关注的重点是图 1 的左边，或使用价值的特性。如此，不把效用和度量归为历史的工作，这些类别在这里被视为政治经济必不可少的方面。第三，焦点从

19 世纪典型商品（如棉花、铁、布等）转移到更具非物质属性的商品（如情感、言语行为和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商品在这个范围内具备越来越多的符号性质（如在玛雅村）。本文介绍了一套描述性的分类，来理解基于符号的政治经济。最后，不像其他融合经济价值和语言学意义的尝试，本文提供的符号活动理论（the theory of semiosis）是基于皮尔斯的符号学分类（semiotics）而不是索绪尔的符号论分类（semiology）。

符号学预备知识

分析商品之前，先要界定一些符号学术语。符号是任何代表其他东西的东西(anything)，对象是符号表示的任何东西，解释项是符号创造的任何东西，因此解释项也是对象之一。任何符号过程都涉及以下三个组成部分：符号一方面表示其对象，另一方面表示其解释项。这使得解释项和对象的关系，与其自身和对象的关系相对应。（科克尔曼 2005；见皮尔士 1966:8.332）。这些关系之间的关系逻辑如图 2 所示。

例如，注意力转换（joint-attention）是一个符号学过程。特别是，一个孩子转向观察父亲正在看什么，或是转向看她的母亲正在指什么，这包括了一个解释项（小孩注意力的转变），一个对象（父母正在尝试做的事情或者指出的东西），还有一个符号（父母们注意力的方向或者指向注意力方向的手势）。通过上面案例，这个符号过程的正式定义提供了一个关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有用描述：在一方面一个自我（或者说“主体”）与宾我（或者说“客体”）相关联，在另一方面又是与他我（alter）（或者说“另一个主体”）相关联的，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他我和其他主体的关系，与自我和其他主体的关系相对应。米德（Mead 1934）曾有名言：任何互动都是一个符号学过程。比如说，如果我收回拳头（行动的第一阶段，或者说是符号），你会躲闪开（这是反应，或称为解释项），让我的下一次出拳（行动的第二阶段，或叫对象）无法击中你。总而言之，日常互动有一个成对组成的结构

(pair-part)，问题往往伴随着答案，提议伴随着接受，指挥伴随着承担，评价伴随着同意，销售伴随着购买等等。这个结构中包含了一个符号学过程，其中，两个要素（符号和解释项）占据最显著的位置。尤其一种表达（或行动），当被理解成想要表达一个提议（或者目的）时，会产出另一种表达（或行动）。最后，对于政治经济学尤其重要的是，一个工具（instrument）也是一个符号学过程，它的符号是一个精巧的实体，对象就是一个功能，它的关键解释项就是使用实体的行为。（只要它发挥工具的功能）。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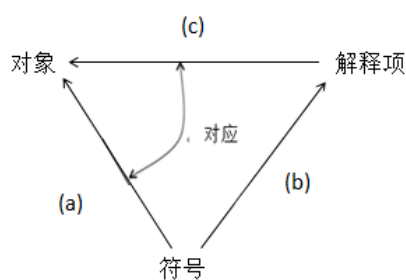


图2
作为关系网中关系的符号过程

一个符号一方面代表它的对象 (a)，另一方面代表它的解释项 (b)，这样把解释项带入与对象的关系 (c) 中，并与它与对象的关系相对应。

符号过程就会涉及到两种关系中的一个关联。这两种关系是：符号与对象之间关系和解释项与对象之间关系，后者因第一种关系而产生。换句话说，意义的建构不是基于单一关系（代表关系），而是基于两种关系（代表关系）之间的一个关联（对应关系）。如此理解意义最大限度地与陈旧的符号定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索绪尔提出能指和所指，是否内部有一个清晰的理解（给一个形象和概念的配对），或者外部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给词和物的配对）。确实，典型的对“符号-对象”关系的关注（或者说是“能指”和“所指”），是

¹ 注意每个符号过程的解释项组件就是初始符号过程的符号本身，因此三重关系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原作者注）

以“符号-解释项”的关系为代价的，这伴随的把对象认为是“客观的”以及把解释项认为是“主观的”的理解（好像是解释项是纯粹被解释出来的一样），是20世纪符号学里最致命的缺陷。

考虑到上文提供的符号学过程的定义，符号的对象与符号所有解释项（适当和有效的）对应相关。（Kockelman, 2015）从定义上讲，对象是相对抽象的实体，它不能与笛卡尔哲学（Cartesian）的广延之物（res extensa）这样的对象相混淆，也不该和单词看似代表的物相混淆——索绪尔定义的牛（ox）和树（tree）那样的“事物”²。确实，最好将对象理解为一个符号的所有解释项的对应集合投影。（correspondence-preserving projection）这个投影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精确和连贯的，在图3的虚线处可以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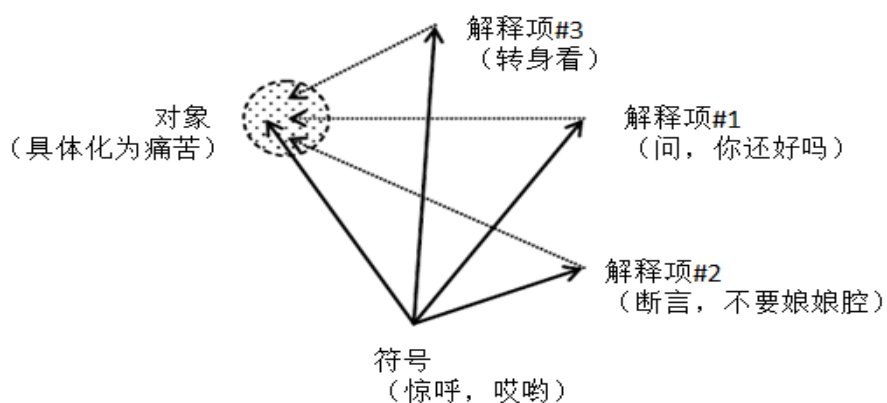


图3
客体作为对应的投射

符号的对象与符号所有的恰当和有效的解释项（适当和有效的）对应相关，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从所有解释项而来的对应集合投影。

比如，一只猫的叫声是一个符号，关于这个符号的对象就是一种对应集合投影，这是人类可能或者一定会（在特定的社群中）因为这只猫的叫声所表现出的行动（或者说是解释项）：把猫抱起来然后宠爱它，轻抚猫的下巴，然后大声说出“哇，这只猫真可爱！”，发出一个富

² 笛卡尔对象可能构成一个符号对象存在的理由,并因此为代表对象的符号的解释项提供理由。（原作者注）

有同情心的低沉的嗓音，然后继续抚摸它，即使当有的猫需要撒尿时也仍然继续。毋庸赘言，人类倾向于通过从生理学（比如，发音器官已经被激活）、情感（比如“她一定会满意的”），或者目的（比如“她想要我继续宠爱她”）给他们添加注释，从而把对象具象化。同样，一个工具的对象是一个功能，这意味着，功能是各种合适和有效使用（常规）此工具的行为（解释项）的对应集合投影。

最后，这个基础（ground）是符号和符号所代表的对象之间的关系（Peirce 1955a; 参见 Parmentier 1994）。众多周知，就规约符号（symbol）而言，这种关系是任意的，它通常被认为建立在“规约”（convention）之上，如“男孩”、“奔跑”这样的词语。就指示符号（indices）而言，这层关系是基于时空邻接或因果关联，像“哎哟”这样的感叹词、发烧这样的症状都属于指示符号。像似符号（icons）中，符号和对象的关系是基于质的相似性（外形、尺寸、色彩或纹理等），例子有肖像和图表等。毋庸赘言，工具的基础是相似和指示的。因此，恰当和有效（比如受到文化的制约）的使用是部分由可行性和有效性（比如受到自然的制约）的决定。举个例子，虽然一个人可以把锤子当作螺丝刀使用，但不太可能把锤子当作一把椅子用，反之，虽然一个人在剪彩仪式上或许可以用剪刀或剪树枝的大剪刀剪彩，但使用弹簧刀则不合适。简而言之，工具是存在于像似-指示符号和指示-规约符号的边界上，可以被不恰当地使用却也能依然行之有效，也可以被有效的使用同时却变得无效。包豪斯设计学院的“形式服从功能”关键口号本质上是主张，工具的基础，或符号（作为巧用的实体）和对象（作为功能）的关系，理应是最大限度的像似-指示性（理据性）和最小限度的规约性（或者说是任意武断性）。

把前面所讲述的想法都放在一起，就有一列的三重区分。第一个，任何的符号学过程都由三个部分组成：符号，对象以及解释项。同时，又有三种基础，或者符号-对象的关系：

像似性（质），指示性（邻接），以及规约性（规约）³。这些区别松散关联到之前发现的哲学系统里。比如，黑格尔（Hegel）关于现象学的理解，包括了感官（sense），力（force）以及知性（understanding）。康德（Kant）关于形式的理解，包括了或然的（possibility），实然的（actuality）以及必然的（necessity）。最后，皮尔斯的那个著名的难以界定的第一性，第二性以及第三性的分类（1955b），最好理解为属类，这其中就包括了先前提到的种类。尤其是，第一性之于第二性之于第三性，就像符号之于对象之于解释项，像似性之于指示性之于规约性，像感官之于力之于知性，以及像可能性之于现实性之于必然性一样。确实，考虑到第三性以第二性为先决条件，第二性又以第一性为先决条件，皮尔斯的理论假定人类特有的符号过程（转到第三性：规约符号和解释项）模式是基于第一性和第二性（像似符号和指示符号，符号和对象）的。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就是符号学的唯物主义。详见表 1。

索绪尔更出名的大多数分类（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等等）可能会用皮尔斯的范畴来理解（因此符号论可能会被纳入符号学的框架），但是这种逆向的思考并不正确。比如，索绪尔并没有考虑到解释项的问题；没有理解意义是关系网中的关系；⁴没有综合考虑非语言符号；没有理解到理据性意义（motivated meaning）的基本性质（而这也组成了大多数意义的模式）。⁵这就是说，索绪尔的理论维度比其所试图理论化的过程要狭小。正是因为这个原

³ 有三种解释项，称为：情感解释项，能量解释项，和再现解释项（科克尔曼 2005:274-284），这些对理论化“体现”和“情感”必不可少。（原作者注）

⁴ 索绪尔的确理论化关系中的关系的价值：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所有）其他符号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中介的。这是一种不同的关系之间的关系，并且，尽管对定义符号结构非常关键，但对于定义一个符号学过程毫无帮助。（原作者注）

⁵ 虽然索绪尔通过拟声词的例子强调像似性，但他坚持任意武断性而非理据性，其实是规约性基础和像似

因，大多数试图结合索绪尔和马克思、或更普遍地结合语言学与经济学的尝试（Baudrillard 1981; Sahlin 1976; and Saussure 1986）都以失败告终。⁶确实，和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引入到（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尝试要成功得多，沃洛希诺夫（Voloshinov）（1986）和维果茨基（Vygotsky 1978）等人是这方面的代表。⁷当然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与许多学者一直致力于塑造的索绪尔框架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了历史、主体性、能动性、无意识、权力关系、理据性意义（motivated meaning）等理论。此外，索绪尔理论系统中对整体论、差异之上的同一性（identity through difference）观念等闪光点，本就借由黑格尔的逻辑以全体性和关联性的方式展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参见 Hegel 1991; Lukacs 1994; Turner 1984）。目前来看，皮尔斯构建的系统避开了所有结构主义的缺陷，因此也使得大多数后结构主义批评变得多余（Colapietro 1989; Kockelman, 2005），符号学和政治经济学也变成更兼容的理论。

表 1 符号学分类概要

	现象学	形式
符号学过程	基础 (黑格尔)	(康德)

-指示性的基础之间的区别。（原作者注）

⁶ 更多讨论参阅格雷柏（Graeber 2002）：实际上，史密斯（1976:17-18）和马克思（1967:79, 94; 1973:162-94）

很久以前评论语言意义和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或沟通和交易之间的关系。（原作者注）

⁷ 还有另一套重要的语言和政治经济的文献（弗里德里希（Friedrich）1989；伽（Gal）1989；艾文（Irv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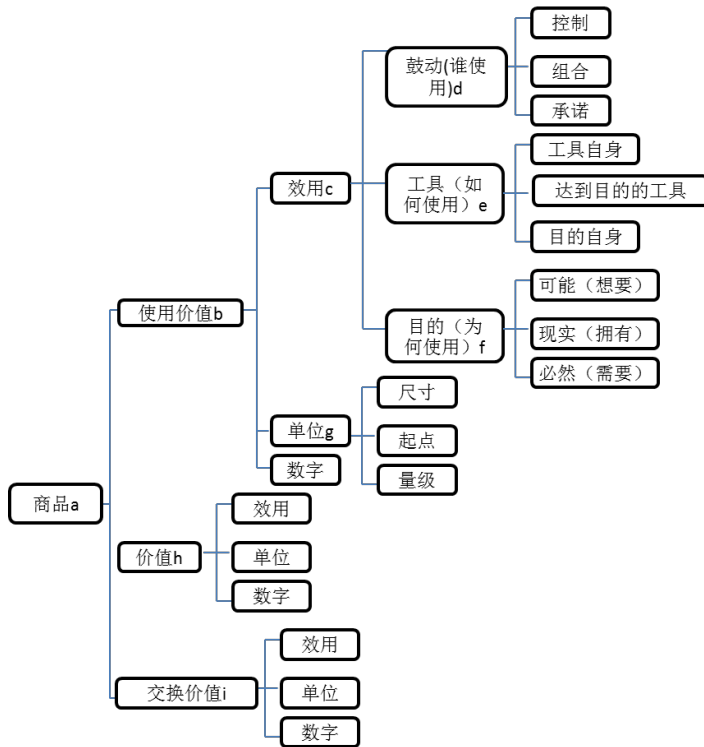
1989;威廉姆斯（Williams）1977);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语言(麦克洛斯基（McCloskey）1998;沃尔夫（Wolff）

1988).（原作者注）

第一性	符号	像似性（质）	感官	可能性
第二性	对象	指示性（邻接）	力	现实性
第三性	解释项	规约性（规约）	知性	必然性

分类的应用

表 2 显示了商品的符号学本体论。可以看到，每一个词分为次级的三类。从左向右移动，然后再向下向后，这些类别如下：商品（a）展开为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b）展开为效用（utilities），单位（units）和数字（numbers）。效用（c）展开为鼓动（instigation）、工具（means）和目的（ends）。鼓动（d）展开为控制、组合（composition）和承诺（commitment）。工具（e）（means）分节为手段本身，达到目的的手段（means toward ends）和目的自身。目的（f）展开为一个人想要的（可能），一个人拥有的（现实），以及一个人的需要（必然）。单位（g）展开为尺寸（dimensions）、起点（origos）、和量级（magnitudes）。价值（h）展开为效用（utilities）、单位（units）和数字（numbers）。交换价值（i）展开成基本形式（elementary Forms）、总体形式（total form）和普遍形式（generalized forms）。我们将会看到，在另一个符号学框架看，交换价值自身也只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所以这一展开次级类别的过程可以无限延续下去。正如马克思的商品本体论（回想图 1），这些类别——第一性、第二性，第三性方面的理论化——只体现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关系、符号学实践、物质过程中。下面将更加详细地讨论上述这些分类。



然而，在继续之前，必须十分明确地确定这个观点：接下来对这些分类的调度应被理解作为一种策略，而不是一个系统。理论上说，可以介绍的三维分类没有终点，从现象上看，商品可能出现的形式也是没有终点的。选择这些类别是因为他们与马克思的原始区别紧密相关（因此应该是熟悉的），也因为它们在当前语境中特别突出（因此应该是相关的）。它们不是为了圈定真实的事物，也不是为了表达理想的类型，而是提供一种实用的类型学（pragmatic typology）。因此，最好将它们理解为一套灵活好用的工具，设计用来以精确分析（但依然是开放的）和简单经验主义（但仍是局部敏感的）的方式解释广泛的民族志数据。因此重要的是不是它们的真实性，而是实用性。

a. 作为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商品

马克思的商品本体论中的三个主要类别：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须强调的是，任何可以被人类用某种方式使用或消费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使用价值（例如，一块面包，一壶酒，两把刀）。任何给定数量和单位的效用或使用价值，可交换成另一个使用价值，那后者

就成为它的交换价值（例如一块面包可以换三条黄油、一条腿的羔羊或 100 张纸）。刀、面包、黄油、羊肉和纸这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交换中等比例地等同于一个东西，表明这些东西包含不同数量的被称作价值的普通物质（substance）。商品就是任何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东西，后者被表述为交换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言，交换价值是“包含在价值之中又和价值相区别的表达式、现象形式。”（1967:45）。

就第 2 节介绍的类别而言，商品是一个符号学过程，符号是使用价值，对象是价值，解释项是交换价值。因此商品包含了关系之间的关联：使用价值一方面和价值相关，另一方面和交换价值相关。这样，使交换价值和价值的产生关系，并与它自身和价值的关系相对应。图 4 展示了关系之间的关系。

此外，假若一个符号的对象就是所有和其相关的解释项，那么使用价值的价值是和它并行（collaterally）相关的所有交换价值。⁸并行关系（collateral relation）是一种特殊条件的关系，即被讨论的对象通过通约的方式关联解释项，也就是通约出相应数量的共享质量。参见图 5。从对应关系到并行关系的运动将经济价值从更普遍的意义区分出来。⁹这样，虽然一只猫的咕噜声和一个商品都是符号学过程，属于同一类别，它们实际是非常不同的种类。

⁸ 萨文(Savan 1976; 转引于 Colapietro 1994:16)将对象定义为与所有其并行相关的解释项。因此,这里是借他的术语,而不是他的定义。(原作者注)

⁹ 条件性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种类是逻辑性关系:当讨论的对象通过推理衔接(辩证的和严谨的演绎和归纳)和解释项关联,对象和解释项逻辑关系就是所谓的命题(例如声明话语的对象,如“猫在垫子上”)。符号学或者对真值-条件意义的研究基本上是用命题内容对待符号的符号学的种类。(原作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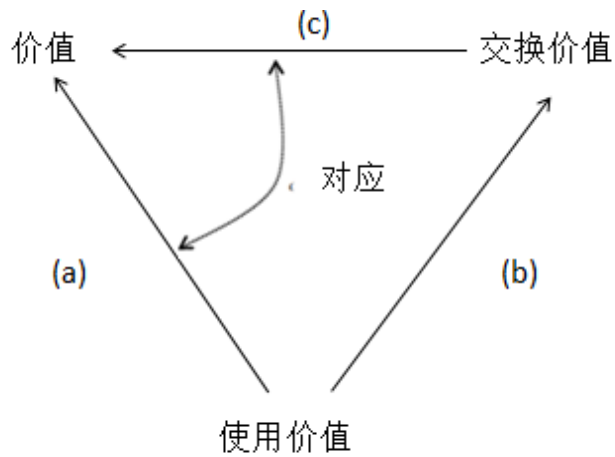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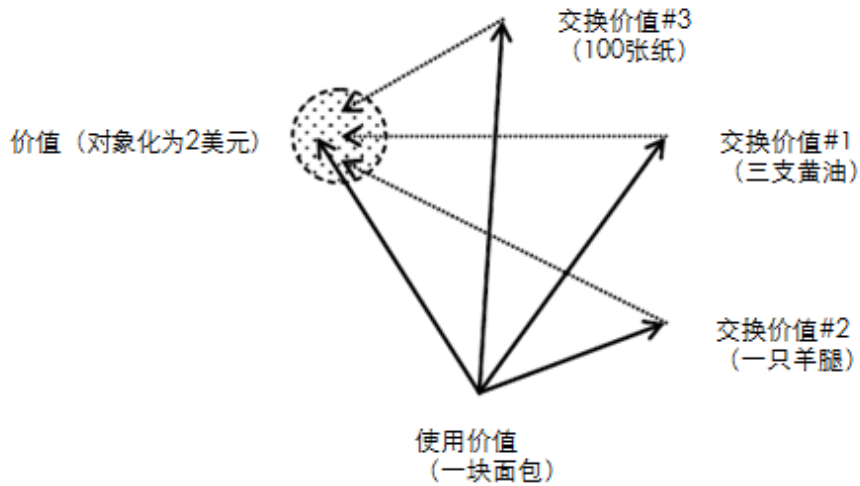


图4
作为关系中的关系的商品

使用价值在一方面代表它的价值 (a), 在另一方面又代表它的交换价值 (b), 以这种方式, 就把后者带到与前者(c)对应关系的关系上了。(a)



使用价值的价值是附属相关的使用价值的所有交换价值。当讨论中的对象 (这里指价值) 与同量的解释项 (这里指交换价值) 相联系的时候, 这种附属关系就是一个特别的条件关系: 一定比例的共享质量。(比较图3)。

这样对商品的符号学理解促使了这个事实, 马克思的系统中有三个关键类别 (而非 2 个): 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因此, 促使为什么经济有三个关键组成部分: 消费 (面向使用价值)、生产 (面向价值)、和流通 (面向交换价值)。此外, 这样的定义不仅强调商

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东西），涉及生产、消费和流通，而且它也是一种关系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过程中）。

最后，对商品的这种理解提供了一种手段来区分不同的价值理论：有的理论假设使用价值的价值决定了它的交换价值（即一个符号的对象决定其解释项）；有的理论假定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决定它的价值（即一个符号的解释项决定其对象）；有的理论假定使用价值的效用决定其价值（即符号决定对象的解释项）。这些理论与劳动理论的价值、市场价值理论的价值以及效用理论的价值相符。正如在（h）节，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虽然通常被称为“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提及了这三个过程。¹⁰

b.使用价值作为效用、单位和数字

使用价值分成三部分：效用（即一种无形的物质的东西，某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利用其做某事）；一个单位（即一个非物质的形式，效用通常在其中成形）及数字（效用单位的数量）。例如，在三小块黄油的表述中，数量为三，单位为小块，效用为黄油。在马克思的本体论中，这三种区分根据质量和数量表述——有两种结果：有时数字和单位合并为马克思的数范畴（如三小块黄油 *à la three pats of butter*），有时单位和效用合并为马克思的质范畴（如三把刀 *à la three machetes*）。也就是说，在处理可数名词和可用复数形式或概数表示的名词（即类似刀、树和衬衫的物质）时，马克思以数字来衡量数量范畴，用单位和效用来衡量质量范畴。而不可数名词和不可用复数或概数表示的名词（即类似黄油、水和时间的物质），马克思用单位和效用来衡量数量范畴，用数字来衡量质量范畴。¹¹见表 3

¹⁰ 尽管价值仍然是核心组成部分：生产创造价值，使用价值承担价值，循环实现价值。（原作者注）

¹¹ 三重区别从而强调不同的点。可以专注于不同的度量单位（小块和蒲式耳，秒和升；度和焦耳，字节和小时）。可以关注不同的单位系统，标准化的历史和系统改良的历史：从常衡到度量标准，从竞争系统到单

事实上，许多所谓的非物质商品都不容易成为可量化为上述的三位一体的单位。或许很难评估哪些效用被测量（例如感情，信息，创造力和智商），可能很难评估哪些单位和效用会出现（例如一个字节的信息，一个爱的拥抱，一个好主意），可能很难计量效用的单位。任何民族志上充分考虑使用价值，任何真正的经济人类学，都必须调查所有这些种类参数和过程。

表 3 分解的使用价值

符号本体论	数字	单位	效用
马克思可数名词的本体论	数量		质量
马克思物质名词的本体论		数量	质量

鉴于刻板的使用价值是一种工具，使用价值同时一个符号学过程（即商品：包括使用价值作为其符号、价值作为其对象、交换值作为解释项），而这个符号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符号学过程的部分（即工具包括符号的巧用实体，作为对象的功能，和作为解释项的使用的模式）。

一系统，从多个当地标准到单一的全球标准，等等。确实，人们可能不关注度量单位，但关注测量实践——日常生活中被慷慨或贪婪地解释的标准的方式（因此避免）（Kula1986年）。人们可能关注效用和单位不可分割的使用价值（比如弯刀，人，椅子，树木）或效用不能从单位中分离出来的使用价值（例如，水，泥，黄油，影响，和信息）。有更普遍的语言和认知系统，使可数/不可数的区别方式不同。例如，尽管大多数的英文名词是可数名词，普通话（中国）几乎所有的名词都是不可数名词，在尤卡坦人（玛雅）的话中大多数名词是不可数名词，和在霍皮人话中所有的名词是可数名词（露西 1992；沃尔夫 1992）。最后，人们可能关注（影响）不同的效用、单位和数字系统的历史的、认知语言的和政治经济的条件。（原作者注）

(参见图 6。)使用价值的定义不仅如此，更进一步说，任何一个任何学符号过程（包含一个符号-对象-解释项的关系）都可以成为使用价值，只要它作为商品的符号成分。因此，一个商品必然是元符号：包含一个更大的符号学过程，其每一个成分都可以是更小的符号学过程。这样，可以开始更普遍地探讨符号的商品化和符号—对象—解释项的关系：放弃别人解释的符号和解释别人放弃的符号。例如，很多跌到非物质劳动下的（作为服务经济支柱的基本社会过程）仅仅是在第 3 部分描述的卷入一对部分结构的实践，并且举例说明举办和指导卷入生态旅游的实践：问题和答案，提供和接受，命令和任务，评估和协议等等，也就是说日常互动是非物质性劳动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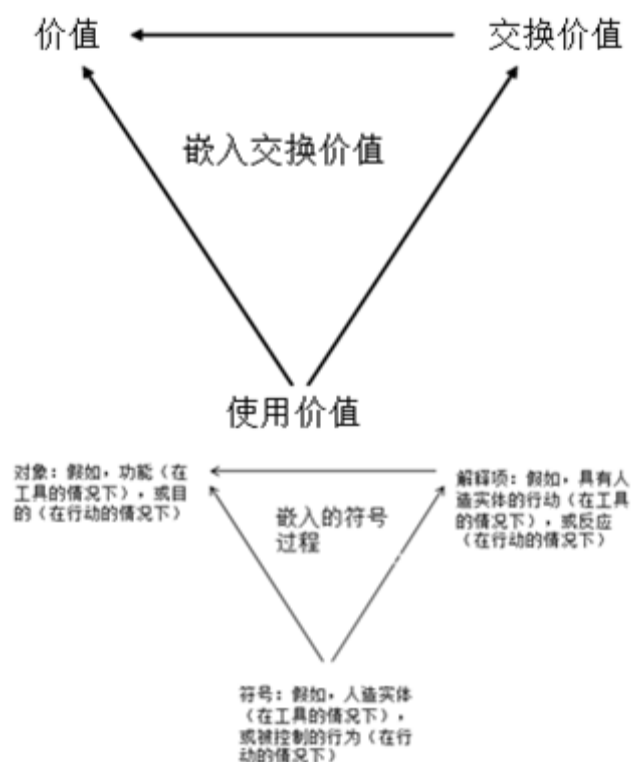


图6
作为元符号的商品

使用价值同时是是符号过程（比如说，工具，是由作为符号的巧用实体，作为对象的功能以及作为它的解释项的使用方式组成的）和更为庞大的符号过程（比如说商品，由作为符号的使用价值，作为对象的价值以及作为解释项的交换价值组成）。这样，一件商品就是元

符号：由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更小的符号过程组成的更大的符号过程组成。

当然，有些东西在一定范围内难以商品化，因为难以交换（若归某人所有），很难确定归属权（为了交换它们），难以标准化（因此在特定的数字和单位交换），并难以一开始就找到用途（因此有交换的理由）。第一类的例子是不可分割的财产（手臂、心、姓名、儿子等等）；第二类的例子是公共资源（氧气、湖泊、树林、小溪等）；第三类的例子相对非感官的、非永久性的和不可分割的东西（记忆、信仰、思想、言论）；第四类的例子是无用的或无处不在的东西（灰尘、鼻涕、等等）。事实上，很多非物质劳动的成对的部分实践遭遇了几乎所有的困难。尽管如此，服务经济早已构成为经济。并且更普遍的是，人类已经通过寻找分离（alienating）、命名（titling）、标准化、使用的方法来将上述类型的成员商品化。

众所周知，一旦商品化，这些成分的经济价值可能会取代其他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无限的有意义的品质被减少到不同数量的一个单一的品质。例如，“功能”和“目的”（作为被嵌入的符号的过程的对象）被省略，而“价值”（作为嵌入符号过程的对象）被强调。因此，当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家，都会谈到资本从质下降为量所带来的扁平化效应，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并行关系（即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之上的符号学过程，超越了建立关系性（即更普遍的符号，对象，和解释项）之上的符号学过程。¹²常见的是，都知道任何东西的价格，但对它的意义却完全不了解。

C、作为鼓动、手段和目的的效用

马克思把质分解成手段（怎样使用：生活资料 VS.生产资料）和目的（为什么使用：满

¹² 科克尔曼(Kockelman b, c, d)将嵌入兼容框架的符号过程理论化，这样一个可以使用符号的立场分析商品化的过程复杂的人格, 身份, 和记忆。（原作者注）

足温饱 VS.满足爱好)。用在这里，马克思的关于质的见解很接近于之前提到的关于效用的分类，关于效用的性质又分为三个部分：鼓动、手段和目的。然而后面的这两种分类又被地归到马克思原来的分类当中，第一种分类是本质上地为了目的而使用手段达成的，这是超出了马克思的本体论的。简而言之，对任何的效用来讲，我们不仅是要调查它是怎么被使用的（作为手段），为什么使用它（作为目的），也要研究是通过什么来被使用（作为鼓动）。

效用的分类很有必要参考 3W：谁（who），怎么（how），为什么（why）。

D、作为控制、组合和承诺的鼓动（者）

鼓动的性质分为三个部分：控制效用使用的时间和空间（何时何地被使用）；决定使用哪一个效用（什么和怎么）和承诺使用效用时会产生的效果（为什么和什么效果）。套用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来表述的话，提交者决定了目的，设计者决定了手段，掌控者决定了何时何地手段将被用来为目的服务。¹³这样，对任何效用来讲，必须要在以执行者为基础的鼓动（控制：何时何地），基于手段的鼓动（组合：什么和怎么样）以及基于目的的鼓动（承诺：为什么以及有什么影响）这三者里面做一个区分。诚然，将所有的点置于一个符号学习语里（Kockleman 2005）：一个是掌控着符号的表达（比如何时何地使用工具或者采取行动）；一个是组成了一个符号——对象的关系（使用哪个工具或者采取哪一步行动）；一个是把解释项置于符号——对象的关系中（在工具被使用的时间和地点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或者在采取行动的时间和地点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例如，许多现代消费品承诺提供、或实际提供更大程度的鼓动或推广。一个恰当的例子是现代的电脑商品及数字化的商品变得更加普遍：通过变得越来越便携，这些商品允许

¹³ 这种方法起源于 Varro 和高夫曼（Goffman）（Kockelman 2004）。（原作者注）

使用者更加自如地控制他们；通过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允许使用者进行更多的组合；通过变得越来越可预见，它们允许它们的使用者更容易实现承诺；确实，这个反射过程现在变得 longer：电脑允许使用者使用，或者代理这个生产过程本身。比如说，一个人在考虑购买或者实际购买汽车之前，就可以舒服地坐在家，在网上组装一辆汽车，混合和匹配它可以拥有的功能，甚至可以进行“试驾”确定汽车的性能（见哈维 1989 早期的关于“灵活性”的讨论）。

通常来讲，我们思考一个单个个体的控制、组成和承诺。然而，每一个鼓动的模式，每一个维度的结构，都可能会被群体完成。而且，每一个或者全部的鼓动的形式都可能被一群个体完成。甚至，即使只有比喻地讲，他们中的每一个或者全部都可能被相同的个体的部分完成：身体控制着思想的组成和承诺的意愿。一般来讲，这些模式中的每个环节都不需要在同一时间或空间完成：可能由一个控制着（此时此地）、由第二个人（那时那地）组合、第三者（其他时间和其他地点）承诺。实际上，当我们所讨论的符号（对象和解释项）涉及到“成对部分”（pair-part）结构时，比如正在进行的谈话、生态旅游中的游客和导游或者我们接触更多的文本（discourse），整个互动都是鼓动，因此要进行定位、个性化、控制、组合、承诺就显得极为困难。¹⁴

¹⁴ 从现代消费商品(如个人电脑)到 19 世纪生产型大宗商品(如重型机械)、资本的历史来看,在某种程度上,由一个运动使它具有以下特点——从简单的合作通过制造到工业——即每一个劳动者在任何的劳动过程都有越来越少的控制,越来越少的成分,越来越少的承诺 (马克思 1967:296-475)。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控制、成分和承诺是由资本家决定而不是无产者决定的(实际上是由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家决定)。这是因为任何一块劳动过程包括很多劳动者使全部劳动者构成了单一的控制者、成分和提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劳动过程在空间如此广泛散播和延伸(如细节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生产力获得越来越多的控制、组

就这一点而言，有观点认为拜物教对控制、组合和承诺超过原有许诺的实体的崇拜的结果。拜物教相信，追随金牛犊、犹太教和基督教或经济学理论，他们将会提供庇护，让果实丰收、避免瘟疫持续、让民族富裕。从这个角度讲，拜物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多维递增的过程：假设一些东西有更多的控制（超过一个符号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达），还有更多的保证（基于将要形成的解释项，因为这个符号—客体的关系会在一个中心的空间和时间上得到表达）。这是没有根据鼓动的后果，也是对被崇拜对象的不公正的描述。

E、作为手段的手段、通向目的的手段和作为目的的手段

对任何效用来讲，有的可以作为调查它的性质的工具。比如马克思使效用在质量的各种方面展开，这里就有两种可能：被直接使用的工具（举例来讲，仅仅用来消耗的使用价值：食物、衣着、家具还有住房）；被间接使用的工具（比如用来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铁，布，刀具，还有织布机）。还有一个相关的区别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2001b）里得到展现：生活资料（比如睡觉的时候需要有床）；生产资料（比如梭子是用来织布的）。马克思提出的区分还可按照如下的几点被再构造：自身就是工具的效用；作为通向其他目的的工具的效用，此时，这个目的是使用价值；自身就是目的的效用。

上述三个分类里的后两个只是马克思的原创区分（分别是间接和直接的工具）；第一个是马克思的另一个分类：劳动力或者就是工具本身——一种没有目标的手段。事实上，在多

合和承诺。（事实上，劳动者单纯的控制权意味着他们没有走向他们不曾承诺的结果。甚至控制变得越来越限制：任何同事、领班和机器需要的时候，他们被迫承担任务，而不是掌握何时何地使用手段的发言权）。

在一定程度上，资本的第四部分中描述的运动是劳动者有越来越少的控制，组成和承诺（通过劳动生产力的集约化处理剩余价值的创造）——更像对象，而他们工作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像主体。（原作者注）

数极端情况下，当劳动力从任何特定的社会历史的语境中抽象出来的时，就是真正“纯粹人类可能”（pure human possibility）。毋庸赘言，这使得劳动力异化变得更具悲剧性。对马克思而言，劳动力就是“一个人的精神上和身体上所有能力的聚合体现，这种能力使得他无论何时都可以用之创造出使用价值。”（1967:164，加黑）。当劳动力得到了使用，就理所当然地通过一个渠道来创造独有的使用价值；但是劳动力本身不是用来创造任何使用价值的。（可以对比一下任何间接的工具——比如，一个织布机可以把纱线织成布）。而且，如果我们把“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能力”这个分类包含在符号能力（比如从人类卷入的各类符号系统中概括出来的语言或者语言能力）的范畴里，并且把这些能力（比如言语或者表现）的实现当成是这些能力的“使用”，那时劳动力的确是一个让人敬畏的力量。当这些一般化的东西对理解马克思关注的 19 世纪的工业资本模式的时，那就使得理解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符号资本模式变得尤为重要——在这其中，价值的自我扩张基于每一种能指或者解释项的模式。

F、作为人们想要的、拥有的和需要的目的

对于任何效用，可以研究目的的性质（使用效用的目的）。对于马克思来讲，这里有两种可能：为了填饱肚子的目的（比如肉和土豆这些常吃的食物）；还有一些就出现在一些人的爱好之中（比如像雪茄和鱼子酱一样的奢侈品）。马克思的分类是以两种形态为基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众所周知，康德分了三种形态：当措辞是基于实践理性时（1993），这就分为许可、现状还有义务；当措辞是基于纯粹理性时（1964），这就分为或然的、实然的和必然的。正如第 2 部分提到的那样，这些与皮尔斯关于第一性，第二性以及第三性的分类相关联。用更加以人类为中心的术语来构建这些特性（或者按照经济理性而非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就可以区分为欲望（可能性）、占有（现状）和需求（必要性）。换句话说，对于目的的提问可能会被一个基于三维的特性来重新构建，这个特性包括想要什么，拥有什么和需

要什么。

虽然这似乎是学术性的分类,但却直接为理解各种系统的差异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作为三个种类可能的组合)尤其是当处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一个人需要他想要的,而拥有他需要的,但是我们的世界并不是完美的世界:我们并不是总是拥有我们需要的;我们也并不总是需要我们想要的。甚至更普遍地,整个区别的八重组类型学也可能是清晰的。例如一个人想要他拥有的东西吗?(如果不想要,那么这种情形就被描绘成冷漠和冷淡)。一个人拥有他想要的东西吗?(如果没有,这就叫做嫉妒和贪婪)。一个人想要他需要的东西吗?(如果不是,这就叫做无知和愚昧)。一个人需要他想要的东西吗?(如果不是,这就叫做误解和错觉)。一个人拥有他需要的东西吗?(如果没有,这就叫做不足和缺乏)。一个人需要他拥有的东西吗?(如果不需要,这就叫做盈余和过量)。很多测量“幸福”的尝试(比如享有“好生活”表现的人口比例)就是来评估上面三个部分中任意两个是否重叠的真正的尝试(通常是按照一个人拥有需要的而非一个人想要拥有的);当他们不重叠的时候(当他们几乎不做的时候),就评估他们偏离的程度。¹⁵

应该强调的是,“需要”的范畴是历史和道德问题,因为它是一个生物学或科学问题;“想要”是一个个人或主观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和道德问题。(见参见马克思 1967:168 关于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对劳动价值的决定)这就是说,虽然将相对跨历史的需求或者相对个人的欲望理论化非常有趣,大多数的需求和欲望都会被由具体的历史特定的社会形态调解,历

¹⁵ 这种分区可能被认为是政治经济的失败(如供需匹配、资源分配等等)和宗教道德的罪恶(指向像嫉妒,假神等情绪的耻辱)。这样的问题可以问如社区一样容易接受的个体:不仅汤姆需要他想要的东西,和拥有他所需要的,而且“我们”(我们可能成为的任何人)可能需要我们想要的,拥有我们所需要的。因此,这种类别是否重叠或偏离可能是由于家长管理他们的家庭像国家管理经济那样。(原作者注)

史观点上的社会形态——它是与必须提出上述问题的社会形态相对的。更可怕的是，现代的生产模式和生产欲望是连接起来的，生产商品以满足生产的欲望；他们和生产的需求连接起来，生产商品满足生产的需求。确实，就像引文里讲到的一样，生态旅游项目投入了和转化游客的欲望和需求一样的巨大努力来培养村民们的欲望和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这些问题恰好归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¹⁶

G、单位作为维度、起点和量级

我们可以研究单位的性质，这是《资本论》中品质范畴的一部分（也就是使用价值的测量）。对马克思而言，这里有两种可能：自然的或者有理据性的单位（比如英尺）；和规约的或者任意的单位（比如米）。毋庸赘言，这种区分是非常著名的，从亚里士多德（自然 VS 规约）一直沿袭到索绪尔（理据 VS 任意）。甚至连库拉（Kula 1986）这样严谨的计量学者也发现这种区分对把测量归类到这两种类型——功能的和再现性的是很有帮助的。现在的目的，

¹⁶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有像霍布斯（Hobbes）和拉康（Lacan）这样的理论家认为欲望天生是无限的，也有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马克思（Marx）这样的理论家认为没有限制的欲望对交换价值（或数量）是个问题，因此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来说也是个问题。因此，前两个理论家将资本主义看作仅仅将现代社会的核心实例化；后两个理论家认为前者仅仅根据一个假定的“自然状态”将资本主义的核心自然化。事实上，非常悲观地说，资本主义经济可能被理解为将社会建设（或在这个世界上被允许的和必须的）看作自然（或在任何世界上可能的和必要的）的社会形态。这样社会历史特定机构的成对将机构的限制和需求作为跨历史对待（对可能发生的东西永恒的限制，对必要的东西的永恒的需求。这样，权限和义务，或第二性质，被物化（reified）为可能性和必要性，或第一行性质。不用说，物化通常和拜物教齐头并进。（原作者注）

在一套合适的区分被引入来充分地发展马克思的判断的时候，需要展开居间的一套区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存在两个横切的问题：第一个，一个可测量的单位需要什么样的参数（维度，起点，量级）；第二个，参数如何与被这些单位测量的效用联系起来（像似的，指示的，规约的）。

一个可测量的单位有三个基本参数，也就说我们提到的“维度”的概念（比如长度、重量、时间、温度等）。不那么严格地讲，这是一个关于测量什么问题。“起点”和哪一个维度被测量（比如纬度里的北极点、水的结冰点、耶稣的出生日期等）相关。宽泛地讲，这个问题是关于从哪儿开始测量。最后，宽松地说，测量的量级（比如磅与克、小时与秒、摄氏度与华氏度等）是一个关于能测量多远的问题。维度、起点还有量级是任何可测量单元的关键参数。比如说，关于“热”，它的维度就是温度（比如，身体自由的平均动能）。起点取决于被使用的测量系统：这可能是水的结冰点（摄氏度）或者是最小温标（开尔文）。量级取决于尚存争议的在测量系统里的温度单元有多大：摄氏度相对于华氏度来讲量级较小。¹⁷

转到马克思的原始的区分上，这些参数（维度、起点、量级）都可能具有像似的、指示的和规约的特性。像似的单位具有与它所测量事物共同的品质（因此维度、起点或者量级可能或多或少都是像似的）。指示的单位与它所测量的事物具有暂时的，受空间条件限制的，或者偶然的相近性。（因此，维度、起点和量级可能或多或少都是指示的）。另外，规约化的单元与它所测量的事物没有任何共同或者联系的地方。（因此，维度、起点和量级可能或多

¹⁷ 最后，请注意，任何测量相同维度的单位，（例如，摄氏和华氏度）可以表示为彼此的线性函数： $F=mC+b$ 。这里， b 就是函数图形与Y轴交点到原点距离，并且本质上表明了两个测量在起点上的不同； m 是斜率，本质上说明了两个测量在量级上的差异。因此，如果在C代表摄氏度，F代表华氏度， $m=9/5$ ， $b=32$ 。换算是一种解释。（原作者注）

或少都是规约的)。¹⁸因此，在马克思的原初系统里面，自然的单位包括像似的和指示的；规约单位卷入了象征性 (symbolic)。

H、价值作为效用、单位和数字

在 b 部分里讲到的所有事物把使用价值的分解看成是持有价值的效用、单位和数字。这个部分关注的是决定商品价值的过程而非只是重复上面的讨论。尤其是，认为“劳动价值论”这个术语是用词不当并且建议这里应该有三个本质的因素：产品，流通和消费。

对马克思而言，任何使用价值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其中的劳动力的数量决定的，而这些劳

¹⁸ 必须强调的是，测量的东西非常广泛。就像似性 (iconicity) 而言，一些测量方法和被测量的效用有共同的品质，一些测量方法和测量者的身体有公共的品质，一些测量方法和测量者所在的世界有共同的品质，等等。例如，不同空间面积的单位（用于农田）随需要播种的种子数量、除草所需的时间或收获需要的家庭成员数量而变化(Kula 1986: ch. 6)。就特定商品而言，这些单位依生产者的特点（脚，肘），生产工艺的特点：（样本：布匹大小布被织机固定），或产品的特点（面包）。（这里，又出现了刺激、手段和目的的区别）。其他的，像脚，原本基于身体的大小（测量者的）；而米最初基于行星的大小（测量者居住的）。

还必须强调，这些都是相对的概念。例如，开氏温标（绝对零度）的零点比摄氏温度的零点（水结冰的点）相对更积极：它和自然本身的特点（熵）有共同的属性和因果关系，而不是自然与生物的相互作用（水）。并且，宇宙论的时间尺度的起点（宇宙大爆炸）比公历时间尺度的起点（基督诞生）更具理据性。

或者，例如，光速的尺度是比音速的尺度相对更积极：前者包含宇宙中的任何地方（也和大量的基础规律紧密相关）；后者仅仅包含地球的大气层（也仅仅和小部分的陆地规律关联）。一年的时间幅度是比一秒的时间幅度更具理据性 (more motivated)。或者，例如，长度的尺度是比价格的尺度相对更有理据。波长的尺度比颜色的尺度更有理论。“更具理据性”这个表述指的是一个单位的三个参数中的一个或多个会包含更大范围的语境，只要他们和“自然属性”（这里的意思是服从现代科学家研究的规律的任何世界必要的和可能的特征）有共同的属性（像似性 iconicity）和因果关系（指示性 indexicality）。（原作者注）

动力的数量又是由生产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含了几个要素，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在正常生产状况下，以平均技术水平，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的普遍劳动强度下生产一个物品所要求的”持续时间（1967： 47）。例如，如果动力织布机的引进使织一匹布的时间降低了一半，那么那些继续用手织布的人就会发现他们的劳动价值减少了一半（1967:47）。任何使用价值的价值因此像似-指示性地和生产特定使用价值的劳动相关联（“指示性的”是因为因果关系被意识到了；“像似的”是因为被恰当的合并在一起）同时，任何使用价值的价值因此像似指示性地和生产其他使用价值的劳动相关联（“指示性地”是因为在任何统计整体中，每一个部分都和整体的其他部分相关联；“像似的”是因为部分相对于整体是成反比的）。正如马克思写道的，“因此一件商品的价值直接地随着商品的数量而波动，也随着其中所包含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产生相反的变化。”（Marx 1967:48）

但是马克思明白价值的变化不仅发生在生产上，而是产生在经济的三个进程上：生产，流通和消费（1967:46-48, 108-109）。特别是“社会必要”这个表达有许多功能。首先，正如刚刚讨论过的，它和平均劳动生产率相关，贯穿生产单位（例如工厂）的整体，产生相同的使用价值，分享相同的市场，并且在相同的商业圈中进行操作。其次，它必须处理如此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效用，“除非成为效用的客体，否则任何东西都没有价值。如果事物是无用的，那么包含于其中的劳动也是无用的；劳动不作为劳动而计算，就不会创造出什么价值”（1967:48）。这就是说，如此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效用必须被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所渴望所需要，否则使用价值就没有价值：因为效用并不是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而是存在于使用价值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之中。最终，有用性本身并不抽象地被决定，而是由供求关系，是生产的使用价值的量与使用者需要、渴求的使用价值的量（在特定市场和产业中）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这个观点十分重要，有必要详细地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说明。

“如果社区对亚麻制品的需求，这一需求像其他所有需求一样有一个界限，因为相互竞争的纺织业者生产的产品已经饱和，我们朋友的产品就变成多余的、过剩的了，因此也就没用了。如果市场不能以正常的两先令每码的价格承受总量的话，这就证明社区的整体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花费过多的时间在纺织的形式上。产生的影响就像每一个个体纺织业者都在他的特定商品上，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花费了更多的劳动时间。”¹⁹（Marx 1967:108-109，作者加重点号）

这种通过生产、流通和消费产生的价值调节可以从表 7 中看到。通过这种方式，商品的价值，将会最终表现在它的价格形式上，或者至少也是与其成比例的。商品的价值正如它取决于生产方式和劳动力（作为生产环节）一样，取决于“供求关系”（作为流通环节）和“欲望与需求”（作为消费环节）。并且，因为由流通的商品和利润时间的长短所决定，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对价格有或多或少的决定作用。

正如可以从前述观点中所推断出的那样，因为涉及决定一件商品价值的统计因素，商品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价值从象征中抽象出来，而只附着在类型上。²⁰正如马克思所说

¹⁹ 所有事情都考虑进来，很难从资本论中找打这样的文章。原因是马克思一般假定稳定动力或平衡条件。然而，非常有价值的是假定稳态和平衡是例外，而非规则，因此供需问题，以及欲望和需要的问题，在价值决定中和劳动力和生产方式一样重要。（原作者注）

²⁰ 皮尔斯（1955a）考查了三种类型的符号，质符（qualisign）是可能和对象搭配的品质。就是说，任何人的感官可以接触到的品质——因此可能代表其他的东西（对某人来说）。单符（sinsign）就是实际上和对象搭配的品质（在某个事件中），有时候他们被称为象征（tokens）。型符（legisign）是必须和一种类型的对象搭配的品质（在所有事件中），他们有时候被称为类型符（types）。比如说，在话语的案例中，质符是潜在的哭喊（比如，人类的声音中什么是令人信服的话语）；一个单符就是一个实际的哭喊（比如，

的“每一件个别商品……都可以被视为它所在层级的普通样品”（Marx 1967:47）。例如，不论是将价值视为一个普通的商品（比如一个烤面包机），还是一个一般等价物（例如一块金砖），或者是一个一般等价物的符号（比如一张美元支票），具体的烤面包机、金砖或者是美元支票都是不重要的。然而，有时候个别商品（token）比同类更有价值：我想要这个搅拌机（它是在展览上用过的那个）；我想要这块金砖（我的祖母把它藏在了地板下面）；我想要这张支票（它是第一张在我的酒吧买东西时所用的支票）。这些重视个别商品胜过其同类的价值的案例，通常要求知道关于此个别商品的身世（worldline）的某一方面：它是如何生产、交换的，以及在它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是如何被使用的。换句话说，不能将一件商品的单个视为副本（replica），它应该被视为一件独一无二的事物。²¹无需多说，这就像生态

感叹词“哎哟”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出来的）；型符是哭喊的一种类型（比如，感叹词“哎哟”在抽象的概念中，或者每一个和“哎哟”的象征符号相近的类型）；在工具的案例中，质符是一些潜在的空虚实体（比如，机床上生产出的任何东西）；单符就是一些因为某些功能而被使用的特别的空虚实体（比如，祖父床上一堆邮件中的一封邮件）；型符就是因为某些功能类型而被使用的空虚实体的一种类型（比如，有标志的床架上的一封邮件）。任何是作为一个类型的型符的象征的单符可以被称为副本。副本，只是运行着的 mill 单符：任何关于单词“哎哟”的话语权；任何在那张有标志的床上的邮件。保持在皮尔斯创立的框架内，我们可以称任何不可复制的或者前所未有的单符为一个奇点-这就是说，任何单符都不是文字的象征。奇点，是独一无二的单符：尼克松的辞职演讲；刺杀林肯的手枪。（索绪尔对于文字和概念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分。相对来讲，就皮尔斯的系统而言，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是真正的型符和 *legi-objects*，或者完好无损的图片和概念。（在有限的标志就是词的案例中）（原作者注）

²¹ 这种单一化的方面可能众所周知，也可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因此这种象征价值可能对很多人或者单个的人是真实的）。可能会不同程度地知晓指示的移除（*indexical remove*）：通过个人经验、出版的历史、

旅游中的一种悖论：游客们受到独一无二的景点的吸引（就像与另一个人进行独一无二的、面对面的交流），但是却为了复制品而付费（就像是调动一种标准化了的交际能力）。

I. 初级的、整体的、一般的交换价值

在其对金钱的分析过程中（1967:55-56），马克思在价值的相对形式（或者说是其价值得以表现的商品）和价值的等价形式（或者说是价值借其得以表现的商品）之间做了区分。例如，在等式“一把刀等于两条面包”中，一把刀就是价值的相对形式，两条面包就是价值的等价形式。任何这一类的等式，都体现了一件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和另一件商品的等价价值形式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被称作（特定商品的）价值的简单（或初级）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样的等式“告诉我们在两件不同的物品中……都存在着等量的、对二者而言相同的某种东西。因此这两件物品必然和第三件物品相等，这第三件物品就其本身而言并非前两者。因此他们二者中的每一个，就其作为交换价值而言，都必然能够被化简为这第三件物品”（1967:45，作者加重点号）。我们可以称这个“第三极”为价值的投射形式。参见表 8a。

表达了任何一个单一商品价值的相对形式和一系列价值的所有等价形式之间的关系的

家长里短、网上传闻等等。它可以体现在不同程度的对象像似性的删除：麦当娜的趾甲（或麦当娜自己）或圣环（或无名指）。所谓的感情价值通常只是人特定的通常与商品经济价值不成比例的象征价值（以个人单一化的传记为基础）。所谓的氛围价值（auroric value）（或者只是氛围 Aurora）通常只是群体特定的与商品经济价值不成比例的象征价值（基于文化单一化的历史）（Benjamin 1968: 221）。总之，有许多不同的路径，通过它象征可能在商品经济中超过一个种类。虽然这些路径都没有改变象征本身，但造成人们把它当作比实际价值更大的价值来对待。这两个过程，不用说，导致人们从事看似‘不合理’行动。总之，正如价值可以超越意义，意义可以超越价值。众所周知，总有不能标价的东西。（原作者注）

任何等式，都可以被称为（特定商品的）价值的扩展（或整体）形式。例如，“一把刀等于两条面包，等于一磅黄油，还等于三把巴克刀（buck-knives）（等等无限多的处于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商品）。”参见表 8b。而且，任何等式，如果它表达了一系列所有商品价值的相对形式和单一商品价值的等价形式之间的关系，那么它就可以被称为（特定商品的）价值的一般形式。例如，“两条面包，一磅黄油，三把巴克刀（等等无限多的处于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商品），都等于一把刀。”参见表 8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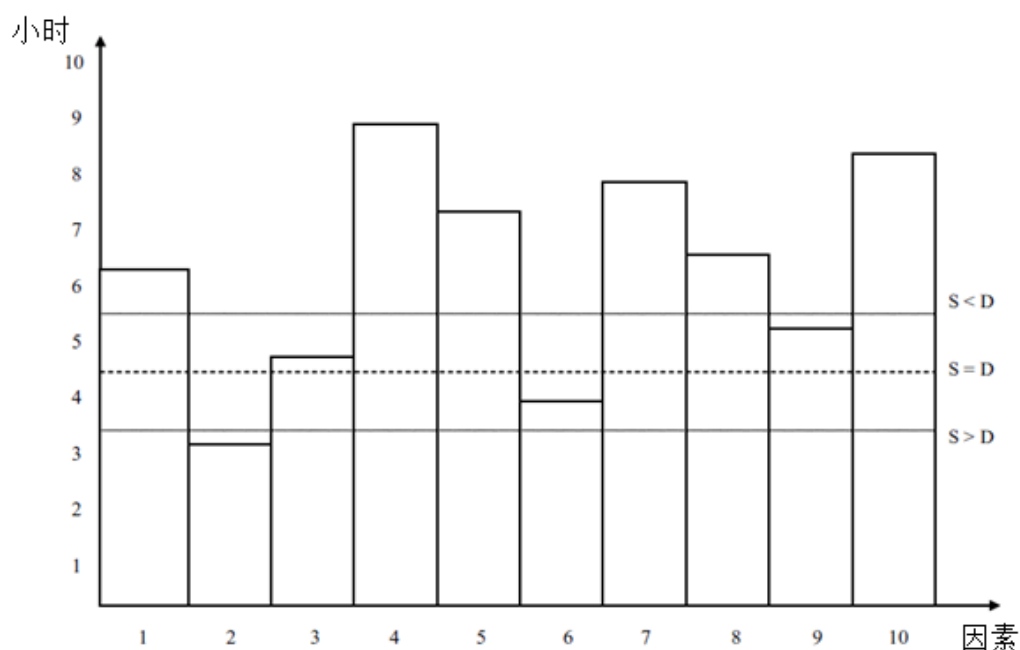


表 7 价值的生产-流通-消费理论

图表显示了每十个面包店生产 100 条面包需要的时间。生产 100 条面包所必要的平均时间是 4.5 小时（如加重的虚线所示）。如果 1 小时=10 美元，那么每条面包应该包含 45 美分的价值。假设有 1000 户家庭每天购买一条面包，那么供应等于需求（ $S=D$ ），而且一条面包确实话费 45 美分。然而，如果家庭的数量增长，那么供应就可能会少于需求（ $S<D$ ）；如果家庭的数量减少，那么供应就可能大于需求（ $S>D$ ）。并且，需求本身以购买公众的欲望和欲望为基础，它们可能会随着这群公众规模大小的波动而进行毫无关联的变化：通过品

味、时尚、假日烘焙，对三明治的狂热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发生作用。在这样的案例中，就好像每家工厂——随后是所有工厂——都比社会所必要的劳动更多一些或更少一些，因此，他们的面包在出售时所达到的价格要么增长，要么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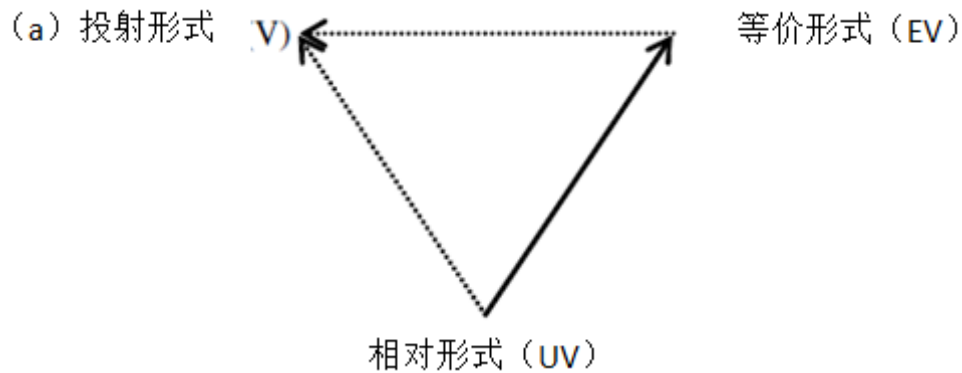


表 8a

价值的初级（次要）形式

价值的相对形式等于价值的等价形式只要二者都可以化简为一个第三者（这里被称作“投射”形式）。例如：一把刀（相对价值）等于两条面包（等价价值）。在一个经济体中的任何两个商品都可以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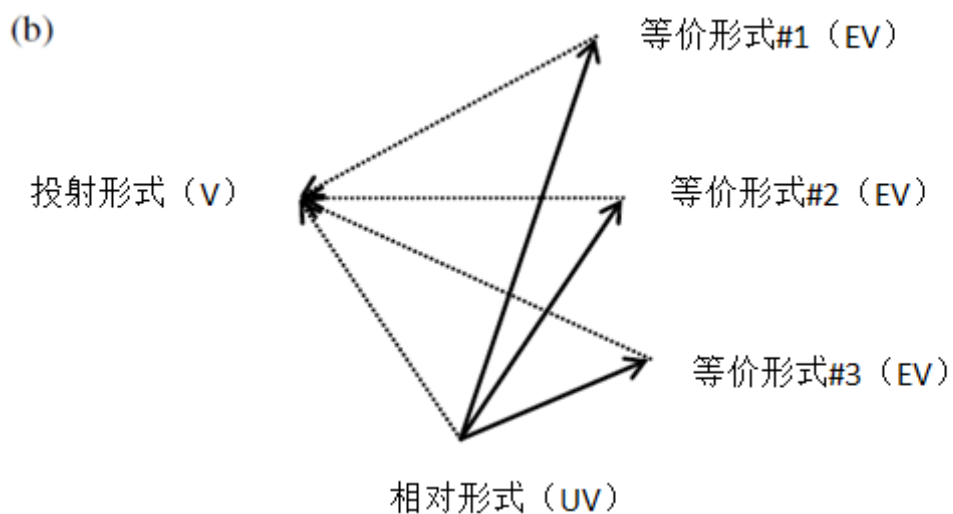


表 8b

价值的整体（扩展）形式

价值的相对形式等于潜在的、无穷多的所有价值的等价形式，只要它们都可以化简为价值的第三种形式。例如：一把刀等于两条面包，一磅黄油，三把巴克刀（等等处于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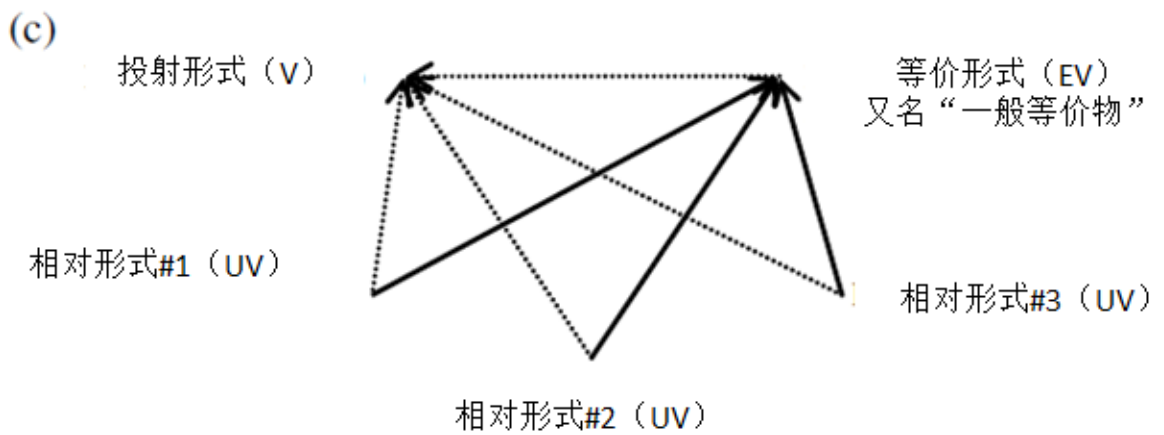


表 8c

价值的一般形式

潜在的、无穷多的价值的相对形式等于单一的价值等价形式，只要它们都可以化简为价值的第三种形式。例如：三把巴克刀，两条面包，一磅黄油（等等处于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商品）都等于一把刀。

任何时候，当一个单一的商品被用来表达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时候，它就被称作一般等价物（Marx 1967:72）²²。一般等价物就是一种从根本上被证明了的所有商品价值

²²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大多数的符号和解释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可以交换：彼此可以为作为使用价值的那个成为交换价值。然而，大多数的符号和解释项不能交换：答案是一个问题的解释，但问题不是一种解释的答案。为保持话语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类比更确切，需要坚持注解的范围（或内部语言和元语言）。在这个领域，符号和解释项互通：el gato（西班牙语的猫）是 cat（猫）的翻译，cat（猫）是 el gato（西班

的形式，就是货币的功能（1967:90）。从这层最基本的意义上讲，任何商品都可以作为货币发挥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一般而言人们习惯选择黄金和白银这样的贵金属来充当一般等价物。尽管这些术语用的如此抽象，货币在马克思的定义中就是铸币，所以这些贵金属就成为了可以计量的单位（这些贵金属具有可以切分，便携和耐用等的功能）。当货币被具有象征意义价值的符号代替的时候（1967；125-30），它就被称为纸币（由于符号通常呈现的媒介以及强调的事实就是它没有任何价值；实际上不需要纸）。因此，我们可以对一般价值形式有三种分类：1）当某种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比如黄金）；2）当一些贵金属，以硬币的形式，成为一般等价物（比如，先令）；3）当一些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价值但本身没有价值（比如美元）。这些类别的规模就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的激励功能。

简而言之，在《资本论》中提供的交换价值的解释已从三个方面被修改。首先，马克思把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视为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正如第一部分介绍的那样，但是，交换价值是这里被视为具有使用价值的解释项，只要他们有一个特定的价值（作为他们的客体）。其次，马克思对交换价值的看法取决于四大类：简单价值形式、价值的总的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和价值的货币形式（Marx 1967:54-75）。然而，本文看来，实质上可以分为三类（基本的、总和以及一般）；一般范畴本身又分为三个小类（一种特殊的商品，铸币，纸币）。最后，马克思将价值的形式分为两极：相对形式和等价形式。而本文则提出三个极点：相对形式，等价形式和投影形式。

牙语的猫）的翻译。并且在这个领域，可以用比喻为被注解（或被翻译）和正被用来注解或翻译的符号的方法来理解价值的相对和等价的形式。价值的基本形式是任何一个单一符号的注解（或翻译），价值的总体形式是任何符号的可能的注解（或翻译）的集合。无论何时被用来注解（或翻译）所有其他符号的单一符号或符号集合，都可能会和一般对等物联系起来。比如拉丁语曾经就作为了一般对等物。（原作者注）

结论：通约是适合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艺术

治理是一个通过正式的自由个人可能产生的行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被激活和被强迫的（Burchell 1991； Foucault 1991）。通约是参考成比例的共享的品质以使不同实体可以比较的过程（Aristotle 2001； Espeland and Stevens 1998； Marx 1967）。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培育作为社会行为的普遍模式的市场化的行为的一种世界观（Gordon 1991）。

这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来自 Foucault（1991）和 Gordon（1991）。在这些作品中，自由主义被表述为国家干预（state-reason）的批判——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了解其经济的限制（广义上的）作为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的关键因素。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在其中，市场是不被理解作为一个准自然和自然的实体，并且不推崇由政府以自由放任的形式管理，而是作为要通过制度和法律形式来培育的实体，以对抗社会的反竞争效应。这样，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干预——如引文中看到的那样，非政府干预——对未来的企业管理来讲，将作为社会行为的普遍形式（参见 Gordon 1991）。新自由主义也比自由主义有一个更广泛的对经济的理解。因此，如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学理解为涉及所有稀缺资源的分配行为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把它理解为一切涉及到战略选择的有目的行为。因此，经济活动只不过是一个有差别的使用，或可用资源的选择。这样的话，经济学是一种解决所有人类行为的方法，并且可以用来指导各种形式的管理（参见戈登 1991 年，在芝加哥经济学院）。

对于新自由主义，自由是有选择的自由，强迫就是限制可能的选择。只要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项之间）取决于这些选项的可比性，并且只要可比性取决于可公度性（选择是判断不同程度，而不仅仅是种类不同），新自由主义和通约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共鸣。如果我们所有可以选择的都是有意义的——就符号、对象、解释项而言——通约就要求有条件的关系可以

还原到并行关系。虽然这种约分被理论家很好地记录（由批判理论家），根深蒂固的（由自由市场），和在如工具这样的刻板的使用价值的情况下。尽管这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通过关键理论家），减少根深蒂固的自由市场。在如情感、演讲行为和社会关系这样的非刻板的使用价值的情况下很少理解和部分管理。简而言之，如果通约是治理适当的新自由主义的艺术，一个商品的符号学本体论对他的关照是必须的。

作者简介

科克尔曼（Paul Kockelman），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解释电脑时代的艺术》、《语言、文化与心灵》、《行动者、人物、主体自我：一个本体理论》。

原文题为 A Semiotic Ontology of the Commodity. 原刊载于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2006, 16(1), 76-102.